

奥伦堡乌拉尔河上的人行步道



← (上接7版)

手面前决意展现的大国威望,另一种则是他们所称的“亚洲人的傲慢无理”(derzost’)。这一词汇频繁地出现于当时的俄国文献中。他们常常抱怨中亚人的蛮横:“那些人不懂得尊重我们的强权,他们应该尊重!”对于佩罗夫斯基这样的人来,这一点是难以容忍的。这样的情况在18世纪也普遍存在,但那时俄国人只是对此感到不满,他们还没有觉得这种情形是不可容忍的。因此,维护大国威望贯穿于他们后来做出的所有决策中。

从经济价值角度来看,沙俄对中亚的征服意义不大,甚至是毫无意义。俄国占领的许多领土几乎不具任何经济价值。对这些领土的管理成本远高于它们所能带来的收入。同时,大部分被征服的领土也没有太大的战略意义。因为既得领土并不容易防御,且代价高昂,很可能引发更多的战争。是的,沙俄的征服使英国人感到不安,但这真的是目的所在吗?实际上俄国外交部的许多官员并不想触怒英国人,但大国威望要求他们继续前进。战争偶尔也会有逆转,1852年,俄国的一支小规模侦察队在阿克梅切特附近被击败。然而,俄国人必然会反击。1853年,佩罗夫斯基便攻占了要塞。之后,俄军在锡尔河沿岸修建了一系列堡垒。这也意味着锡尔河下游的哈萨克人被完全置于沙俄的统治下。可惜好景不长,草原地区中的要塞驻守艰难,耗资巨大。该地区夏季气候炎热,而且当地语言不通。士兵们也开始对征战感到厌烦。然而,他们不能撤出的原因之关键在于,尽管最初夺得这片领土未必是明智之举,但俄国的威望要求俄军现在必须要守住它。而南方不远处的塔什干有农田和木材,适宜构筑边境防线。而当他们攻占塔什干之后,他们找到了支持继续进军的更多原因。而恰恰是俄国人在中亚的存在严重扰乱了中亚各汗国的内政外交秩序,尤其是浩罕汗国和布哈拉汗国。因此俄国人必须通过继续作战来形成与这些地方政权的稳定关系。直到在征服布哈拉汗国的过程中,俄国人意识到他们需要维持其国家结构,因此迫使其成为沙俄的保护国。而布哈拉汗国的国家机器在沙俄的保护下变得比它作为独立汗国时更为强大。

总而言之,尽管沙俄征服是一个充满偶然因素的过程,其中涉及不同因素、不同人物,但贯穿始终的是“国家威望问题”。“在亚洲人和竞争对手的眼中,我们不能显得软弱。”最终,诸如土库曼、哈萨克等中亚汗国没有被俄国视作具有合法地位的外交对象。他们并不被视为国家:他们不具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界定的现代边界,他们没有明确的领土主权观念。因此,俄国人认为无法与中亚各族群和汗国进行真诚的谈判。伊朗恺加王朝则不在此列,它被视作次等但合法的外交伙伴,俄国能够与其达成有效的协议。清政府也是如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俄国先占领而后又归还了伊犁地区。如果你去阅读关于这一事件的公文,你能清楚地发现俄国将中国视为可以进行谈判的对象。事实上,这是俄国外交部对陆军部罕见的一次胜利。出于战略考量,陆军部长和以冯·考夫曼为代表的地方总督希望控制这一地区。他们希望能占领穆扎尔特山口的分水岭。然而沙俄外交部认为,尽管此前向清政府作出承诺的时候,俄国人并不认为清廷有能力收复领土。但清廷做到了。“‘国家荣誉和尊严’(dostoinstvo gosudarstva)要求我们归还领土。”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俄国人觉得“我们在和海盗国家(Pirate State)打交道”。这就意味着当俄国人最终和英国人在阿富汗遭遇时,他们又一次很快地达成了友好协议。因此,沙俄征服中亚实际上并非英俄之间的冲突。虽然英国人在不同时期曾对沙俄的扩张感到焦虑,但需要承认的是俄国人和英国人有很多共同利益。他们都认为彼此处于帝国建设之中。因此,他们能够分别于1880年代和1890年代划定阿富汗北部和帕米尔地区的边界。所以沙俄征服中亚与大博弈无关,也与棉花无关。它更多的是关于大国威望,但这也不是它的全部。我们必须将征服的每个阶段视作一段微观历史,同时还需要考虑到环境因素。比如,锡尔河地区和七河地区的差异是十分显著的。七河省很早就成功地成为俄国的殖民地。这与自然环境有着很大关系。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札记

## “鲍廷博校抄”十五卷本和顾千里校本有何关系?

李庆

要探讨这个问题,应当注意的是:顾千里校本中,有顾千里“二十六日校毕”的题识。此二十六日,根据顾千里题跋所署时日,为嘉庆十年乙丑六月二十六日(参见笔者《顾千里年谱》)。他也是在嘉庆十年校的。

那么,为什么这两个人在相近的时间内,都传抄、校对《元朝秘史》?而从鲍廷博、孙星衍、黄丕烈等的生平年代来看,他们所具有的抄本,也当在此不久。是什么原因在这样一个关系密切的文人圈子中,在几乎相近的时间内,会都对这本《元朝秘史》那么关注?

笔者认为,这和钱大昕在嘉庆九年去世,有密切关系。钱大昕生于雍正六年一月七日(1728年2月16日),卒于嘉庆九年十月二十日(1804年11月21日)(见《竹汀居士自订年谱》,钱大昕自订,钱庆曾续补,香港崇文书局版,1974)。钱大昕从事元代研究,当时就为世间所知。他去世后,有关的资料、他的藏书,自然成为当时和他有关的人们关注的热点,形成当时学界的一种氛围。

嘉庆九年十月二十一日钱大昕去世后一个多月,该年十一月,鲍廷博就校对《元朝秘史》。不能否认,钱大昕去世是触发他抄补的一个契机。

他是否直接从钱大昕家得到什么本子?这姑且不论,从鲍廷博抄本的现存记载看,他手边当有一个文本,又从刻本传录了第四卷到第九卷。或许他所据补的刻本,也就是顾千里《题跋》中所说的称金德舆氏原藏的残本,那个本子只有第四到第九卷。另外有续集两卷。

金德舆为浙江桐乡人。钱大昕曾让他把所藏的残本录出,著录于《元史艺文志》上(见顾千里题跋)。

作为一种推测,钱大昕去世后,鲍廷博是抄录了包括金氏旧藏本内容的钱大昕本。否则,当时,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尚未刊行(《潜研堂文集诗集》的家刻本,最早在嘉庆十一年到十二年才刊行。日本学者原山焯推定《潜研堂文集诗集》刊于1800年。有些介绍《元朝秘史》的文章,殆根据原山先生之说,将钱大昕《元朝秘史跋》列于该年。但考原山的原文,他说明,原文未署

日期,乃根据《潜研堂文集诗集》刊行时间推定,并非确论。其说可再考),鲍廷博从何处得到钱大昕的《跋元朝秘史》呢?论者或曰,跋文也可能是鲍廷博以后抄录的。那么,如何解释那么多传抄的鲍廷博本都有钱大昕的跋呢?都是各自分别再传抄的吗?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小吧。

还有,这期间,顾千里和鲍廷博是有交往的。见顾千里《知不足斋丛书序》引鲍廷博语:“相知二十余年,且于书有同嗜焉”,此序写于“嘉庆庚午(嘉庆十五年,1810年)六月”(《顾千里集》,中华书局,2007,201页)。

鲍廷博比顾千里大近三十岁。请其写序,有惺惺相惜之意。所以,鲍廷博是有充分可能知道顾千里所知的有关情况的。

如果上述推论可成立,那么有关的不少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释。

比如,为何钱大昕的《元史艺文志》不著录十五卷本而著录十二卷本?十五卷本《元朝秘史》乃是从《永乐大典》抄出,《大典》所依据的,当是洪武间刊本,不过按韵重编而已(见张穆《连筠簃丛书》本《序》)。又,洪业先生认为,无论分为十二卷,或十五卷,都不是原来的面目,只是为了著录印刷方便而分的,所以现存本各卷都在五十页前后(“The Transmission of Book Known a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HJAS 14 [1951], pp.433-493. 此转引自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研究》)。作为元史的专家,钱大昕当然知道原来的刻本比《永乐大典》中抄出本更为可靠,从文献著录的角度而言,自然应以正式刊出的为准。所以他编《元史艺文志》著录:“元秘史十卷续秘史二卷”,又云:“记太祖初起及太宗灭金事,皆国语旁译。疑即《脱必赤颜》也。”

其次,顾千里校十二卷本和现传的十五卷本大多相同的问题。顾千里跋中说:曾在钱大昕处见过钱大昕的本子,是没有“忙豁仑纽察脱察安”等八个字的,但现在的鲍廷博抄补本几乎都有这八个字。这说明,鲍氏的抄补本,已经根据十二卷本,也就是顾千

里所见的文本补充过了。

再次,柳存仁先生曾对阮元本有“旁注”感到奇怪:曰:钱大昕以后,阮元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二纪录他采录呈进之本,也有《元朝秘史》十五卷,说“此依旧抄影写,国语旁译”,这下面一句不知道他的真正意思。因为据我们所知,十五卷本是没有“国语旁译”的(见所撰《脱卜赤颜·全真教和《射雕英雄传》》,载王秋桂编《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如果设想,“依旧抄影写”的旧抄,是鲍廷博提供的经过抄补的文本,那这个问题也就可以解答了。因为鲍廷博当时正在帮阮元寻查、抄录希见之书(见下文)。

还有,为何会有那么多十五卷本抄本?因为在嘉庆十年到嘉庆末,顾千里、鲍廷博、张敦仁、孙星衍、黄丕烈等相互之间多有交往,都对古书感兴趣。因此,有鲍廷博题跋的抄本,又纷传到孙星衍、黄丕烈、乃至卢氏抱经堂,其中最好的抄本,自然应该是在鲍廷博生前传抄的孙星衍、黄丕烈等所得之本(黄丕烈本未见,但从陆心源本留存的、有黄丕烈题识的贴页来看,黄丕烈手边当有过一个鲍廷博抄补文本的传抄本)。稍后,各种藏书家的传抄本,概出于上述诸本,误讹、脱漏、错简渐渐增多,乃可想而知。

总之,现传的所谓鲍廷博抄补的十五卷本,和钱大昕藏本有密切关系,已经用残存的刻本校对、补充过,也就是说,和顾千里校本,根据的是同样资料,因此二者实质上就没有多大出入了。

所以,议论“十五卷本”,应该把单纯的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之本和经鲍廷博补抄校对过的文本区分开来。《永乐大典》本原来应该是无正文旁注的。

从文本的源流来看,现传的文本,要说有不同,多是十五卷本传抄中产生的脱漏和错简。而顾千里校本当是最完善的文本。这是老话,经过了众多文献发现比较之后,从文献的源流分析,得出的依然是这个结论。

(作者为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